

文人掠影



何桐楷

张庆田谈「细节」

何桐楷

1972年夏,我到五公村下乡。那天在接待站的房阴下,见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正和修自行车的老王下棋。人们说那就是著名作家张庆田。

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如雷贯耳。他文革前就主编《河北文学》和《蜜蜂》,出版过长篇小说《沧石路畔》和多种文集,尤其小说《老坚决外传》享誉全国文坛,因此人们都叫他“老坚决”。

眼前的“老坚决”却像一个老农民。他坐着马扎,穿一件旧背心,裤腿卷到膝盖以上。低着头死盯着棋盘,很认真的样子。

我崇拜作家,也喜欢下棋,就好奇地凑过去,站在老王身后观战。看老王处于劣势,我忍不住指了一招。这时张庆田抬头审视我一眼,见不认识,就没说话,又继续驱车跳马。

那天晚上,我几次想到他屋里认识一下,但终究没有鼓足勇气。

就在那年,文艺政策有些松动,《河北文艺》试刊三期,于1973年正式出刊,主编正是张庆田。全省文学界都说张庆田是老中青作家的“活词典”,所以在当时文学园地一片荒芜的情况下,由他担任主编,整合作者队伍,应是众望所归。

我那年写了一篇小说,叫《铁书记蹲点》,是根据故乡一个公社书记的事迹构思的。我没信心投寄,先给同事肖献法老师看了,他说:“我认识庆田,我寄给他看看。”

没有料到张庆田先生非常热情,时隔几天即写回一信。他肯定了我的写作基础,对人物塑造,矛盾设置提出意见,尤其是强调要在细节选择上下功夫。他说“人物故事能虚构,细节一定要真实,经得住推敲,人物才能站得住,才可信。”他写了洋洋洒洒两张纸,字迹龙飞凤舞。我虽有字认不出,但我反复读了多遍,对照自己的习作琢磨对照,差距显而易见。我的小说虽没发表,但这是我第一次接到作家的来信,也算第一次受到文学创作理论的启蒙。

后来我在《河北文艺》上多次读到张庆田对文学新秀的点评,其中屡屡中肯地谈到细节问题。印象中,他点评过肖波的《称呼问题》,解俊山的《绿叶成丝》,都有赞扬作者善抓细节的论述。尤其是点评衡水作者郭华一篇小说,称赞其通过跳进几十个土井探测水源的细节,塑造出一个作风扎实的基层干部形象一篇,更使我深受启发。

我与庆田先生没有交往,却因偶然机会被他抓了一个“细节”。

庆田先生扶持青年是不遗余力有口皆碑的。每发现一个有潜质的作者必千方百计给予帮助。为鼓励坝上作者康传熹,在《河北文学》一期推出他三篇小说。后来康传熹做了县政府办主任,一度中断创作。上世纪80年代调到政协又恢复写作。衡水作者傅新友也是文革前即初露头角,文艺复兴后佳作不断。张庆田对鼓励这两个作家,决定在衡水召开座谈会,分析两个作家的创作情况,提高全省小说创作水平。衡水作者也算近水楼台先得月,就通知好几个业余作者参会。

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座谈,但也因此闹个笑话。

那天汽车站前摆一棋势,赌注五元。围观者众,但没人下手。我迷象棋,伸脖去看,似不复杂,就冒了一次傻气,自然是掉入陷阱。这事不知怎的传到张庆田的耳朵。那天休会期间,市文联主席李清陪他散步,恰好与我走个碰面。他笑眯眯地指着我说:“你就是下棋输钱的那小伙子?”

我有些尴尬地笑笑,也不知说什么。李清主席对我说:“你只知好人有好多,不知坏人有多坏,那是写不好小说的。”张庆田又哈哈一声:“这里头套路深着呢!”是说象棋,还是说写作呢?我虽没答腔,但却感觉到了他的亲切、平和与善意,也在心理上拉近了距离。

几年以后,我到县政府当了类似秘书的角色,也从没再写过小说。有一次到省政府送报告,我突然想去拜访张庆田。虽然我与

他并无来往,之前也没拜访过任何作家,况且即使见到,他也不一定能认出我,更不会记得我的名字。但我就是强烈地想去看他。尽管他早已退休,尽管我早已停笔。后来我想,之所以有这次探视之行,除多年对他的崇拜之外,可能是自己心里还存有文学之梦的缘故。

那天我和政府办一位同事找到北马路文联家属院,在一座僻静旧楼的底层找到他家。没想到他一眼就认出我来,风趣地说:“你是爱下棋的那小伙子吧?”但没再说我是“输钱的小伙子”。他问我还写不写小说,我说好几年没写了。他似乎很理解地说:“全省很多有潜力的作者都去写材料了,有的还当了官儿。”因为没带作品,也就很难找到话题。幸好我的同事是五公村人,提到五公庆田先生十分高兴。他六、七十年代常去该村体验生活,自然有很多熟人和朋友,尤其对村里热爱文学的青年大力扶持,给好几个人编发过作品,前几年还把村里一个女青年抽到编辑部实习,使其诗文进步很大。听他侃侃而谈,如数家珍,我自然又想到他在村里下棋的样子,后悔没有趁机向他求教写作,哪怕在棋艺上学个一招两式也好。

说到象棋,后来读过省作协副主席郁葱的《“老坚决”的性格魅力》一文,写到张庆田的轶事:“庆田和振生(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刘振生)、老魏(剧协主席魏宗江)三人晚上总在院里的大树下面下象棋,而且谁也不服谁,下着下着就吵了起来,吵着吵着就把棋盘掀翻了,谁也不理谁了。过了一会,门卫老魏师傅把棋子拣起来,他们三个就又凑到一起,接着下接着吵。”

看来张庆田真是个性情中人。而这个和善的老人,年届八十还认真学会电脑写作,耄耋之年还出版了百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《战火纷飞的年代》。真是文坛的不老松啊!当然,这些信息,我是在悼念他的文章中看到的。我虽没读过这部巨著,但其精彩篇章动人细节是可以想见的。

东篱下



辞穷

贾九峰

透露一个秘密:每位作家都会受到相同的困扰,那就是辞穷。在一些想要表达的思想或是描述的事物面前,找不到最为准确的语言。

这种时候,如果是我,原来可能会寻找一个差强人意的词来代替,放自己一马。现在,我放过自己的方式更为彻底,我选择直接放弃。因为我懂得,语言不是万能的。语言不仅不是万能的,有时甚至是无能的。

总有朋友不无羡慕那些执笔写作的人,夸赞他们词汇丰富,感叹自己语言的贫乏。其实词汇丰富并非全是好事,因为与万事万物相对应的只会有一个词语,有且只有一个,这是绝对的、唯一的。词汇丰富的另外一层意思,即是你要在海量的词汇之中将那个唯一找出来,书写在正确的位置上。这无异于沙里淘金。穷尽自我,最后往往以失败告终。这样的挫败感不是写作之人是体会不到的。

一旦挫败感叠加到阈值,其摧毁力是恐怖的。

近日读书,遇到两则辞穷的例子。

这件事写起来略有些绕。我是从张新颖先生的文章中读到的,张先生在文中直接引用的是吴良镛先生《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》一文中的小段文字。

“她(林徽因)对纹样的独钟和欣赏,每使我想起沈从文来,他是在文学上搁笔而专注于工艺美术的。沈从文向我介绍故宫的工艺美术的造型时,陶醉其中,用带有湖南腔调说:‘好得怕人!’好得怕人!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几乎找不到某个词汇用以直接表述清楚沈先生之意。辞穷之时,不妨转而通感。

“林(徽因)先生叙述线条一时竟找不到恰当的中文词汇,说这线条是‘如此的subtle’(这和沈从文)是多么的一致。”吴先生接着写道:“工艺美术造型美的蕴涵竟使这两位文学

家都一时辞穷,这是多么迷人的事情。”英文单词subtle,有“精致的、微妙的、敏感的”多重含意。在林先生眼中,线条之美必然是复合而多向的,精致,微妙,敏感,她必须同时表达出来,没有前后,不分主次,等量同重。此外,好在还有外文互补。

汉语可谓世界上最讲求多意、最富于变化、最善于造境的语言,依然有力不能及的地方。这无奈多么像我们看到远方极致的美景,却注定走不过去。

附记,我追读张新颖先生的文字,从他写作《沈从文的后半生》开始。我喜欢沈从文先生,由他又及汪曾祺、黄永玉、张充和、张新颖。他们的光和暖既相互交织,又是独立存在的。爱戴,敬佩,仰慕,这些词汇他们都担当得起,可我此处只用喜欢。

多有朋友电话里讨要我的新书,往往最后强调一句——别忘了签名!

我懂得这是朋友们美好的情意,但我从来在这件事上吝啬笔墨。若是追问起来,我皆以字丑搪塞(字丑亦是实际)。个中原因,我从来不说。

多年前我有逛书摊的习惯。在那些满掷于地的旧书中,总有一些模样完整、面目可亲的赠书。每每翻看到扉页上签赠双方的尊姓大名,我都会为作者由衷地感到尴尬。

也许这些书流落街头各有因由。但总有一部分书是主人主动处理掉的。我在试想作为受赠之人,在他决意出手的时刻,看到自己名列其上,会不会有一丝怕被作者发现的心理负担。

我厌恶逢场作戏的交际,可我傻傻地分不清哪些朋友会把我的赠书珍藏一生。于是我选择辞穷,“雅正”“惠存”“覆瓿”,一概全免,只字不题,免去日后我的尴尬、你的负担。

最为深挚的情意是无法言说的,爱情和

友情皆如此。你一旦开口,那份深情同时已变得轻薄。吃惊之余,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
《红楼梦》二十三回桃花雨中宝黛共读西厢,只读得落红成阵,两颊生香,情衷深结。恰于此时,宝玉笑对林妹妹说:“我就是个‘多愁多病身’,你就是那‘倾国倾城貌’。”其实不待林妹妹粉面含嗔地啐他,宝玉自己就知道错了。话再漂亮,都显得轻佻,与那枚珍贵的爱芽总不相称。

黛玉在大观园里一向博得口舌伶俐之名,可对宝玉的真情从未当面遣词。到了最后焚稿一节,很多人读出她的绝望,却不知在她的心中,唯有“辞穷”到世间不留一字,她对宝玉的爱才终得成全,才完美无瑕。

我越来越惯于沉默。这正是辞穷的典型症状。

有人据此推断我清高孤傲,不易接近。我无可辩白,随他去吧。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里讲到一个细节——序子身边的那帮年轻朋友因为听不见汪曾祺讲几句话,便问:“你那个汪曾祺是不是有点骄傲?”序子回答毫不含糊:“这话有点混蛋。说话少就是骄傲?”

“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”回想一下,选择沉默是从我发现语言的歧义开始的。人群(包括亲人朋友)之中,我说的每一句话,即便表达准确无误,无一例外仍会生成诸多不同的理解。如果我试着再做解释,那么得到的肯定会是更多南辕北辙的结果。多歧亡羊,纠缠不清,这令我心力交瘁。我甚至忘记自己当初为了什么而言。

放弃语言,歧义便不再产生。这也是我最初援笔写作的理由。某一天我可能连写作也会放弃,当我因为“辞穷”而失去了表达的欲望。

不过在生活中,我牢记一句话,却忘了说者为谁。“懂你的人,不用说;不懂的人,说无用。”如此看来,辞穷,并没有任何损失。